

# 宋代文学审美特征形成刍议

郑传寅

宋代文学的审美特征非常鲜明:1. 以俗为美成为一种时代审美取向,雅俗并峙成为文坛的基本格局;2. 思虑深沉的阴柔之美取代了唐代文学所创造的才气发扬的宏壮之美。宋代文学审美特征的形成只能从其生长环境——宋代社会去寻求解释。宋代所实施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为文化平民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以俗为美是文化平民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唐代,但其国势却是日渐衰微、积贫积弱的。积贫积弱的国势正是宋代文学尚阴柔之美的现实根据。

宋代文学,乃至整个宋代艺术都有明显的文人化特征,精雅脱俗是其重要的审美品格,这从宋代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中均可见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宋代文学,乃至宋代艺术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以俗为美,通俗文艺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还是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论,俗文学的影响远远大于雅文学。宋代文坛并非只有雅文学一枝独秀,而是雅、俗并峙,这种文坛格局是前所未有的。

俗文学并非到宋代才萌生,但此前她一直处于雅文学的附庸地位,甚至只是一股“暗流”,直到宋代,俗文学才蔚为大观,构成文坛的重要一翼。由于俗文学一向被贱视,统治阶级不予收录,故宋代俗文学作品已大量散佚,但从多种笔记、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俗文学极其繁荣,影响力也远远超过雅文学。

宋代的话本创作和戏曲创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宋末元初人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条记载,仅“小说”家的话本就多达100多种。除“小说”一家之外,宋代“说话”还有讲史、说经和说铁骑儿三家,每一家都有大量的话本作为说话人讲演故事的文字脚本。面向平民百姓的说话吸附着大量的观众。《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通俗文艺之盛曰:

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

等, 诚其角者。嘌唱弟子: 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 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 小说。王颜喜、盖中宝、刘名广, 散乐。……孔三传、耍秀才, 诸宫调。……张山人, 说诨话。刘乔、河北子、帛遂、吴牛儿、达眼五、重明乔、骆驼儿、李敦等, 杂班。……霍四究, 说三分。尹常卖, 五代史。……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 诸棚看人, 日日如是。

《醉翁谈录》对说话的艺术效果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说国贼怀奸从佞, 遣愚夫等辈生嗔; 说忠臣负屈衔冤, 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 令羽士心寒胆战; 论国怨, 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 令羽(壮)士快心; 言两阵对圆, 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 遣才人着意群书; 演霜林白日异天, 教隐士如初学道。噎发迹话, 使寒门发愤; 讲负心底, 令奸汉包羞。

正因为面向大众、表现世俗生活的说话有如此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所以说话艺人能够长期在一座勾栏作场而不需要挪动位置。例如,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 临安北瓦是最大的瓦肆, 有勾栏 13 座, 其中有两座勾栏专说史书, 说话艺人“小张四郎, 一世只在北瓦, 占一座勾栏说话, 不曾去别瓦作场, 人叫做小张四郎勾栏。”很显然, 在当时其影响之大, 绝非“正统”的诗文所能比。

以俗为美不仅仅是平民百姓的审美取向, 文人乃至宫廷亦受到这一审美取向的深刻影响。宋代文人——特别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下层知识分子乐于为说话人、戏曲艺人撰写文字脚本, 这些文人还成立了行会性的组织——书会。文人的参与使俗文学创作呈一时之繁荣。通俗文学反映的是平民百姓的情感、愿望和生活, 即使是表现历代兴亡, 描述忠臣义士, 也是从民间立场出发的。俗, 是其重要特点。然而, 这种俗文学、伎艺却得以走进豪门大宅乃至宫廷, 供达官贵人欣赏。宋仁宗、徽宗、高宗都很喜欢听说话, 南宋宫廷有“御前供话”。冯梦龙(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曰:

南宋供奉局, 有说话人, 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 其作者莫可考。泥马(指宋高宗)倦勤, 以太上享天下之养, 仁寿清暇, 喜闻话本, 命内珰日进一帙。

《梦梁录》卷 20 亦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的记载。

宋代教坊经常为皇室和达官贵人献演杂剧。《武林旧事》卷十载有“官本杂剧段数”280 本。所谓“官本”, 也就是包括宫廷在内的官府演出本。280 本已不算小数目, 但它显然还不是宋杂剧的全部, 从宋代都市瓦肆林立、勾栏众多, 杂剧演出十分红火的情形看, “官本杂剧段数”当属于挂一漏万的记载。尽管如此, 我们仍能从中窥见宋代杂剧创作之繁荣和上流社会以俗为美的审美取向。除杂剧之外, 宋代还有南戏。明徐渭《南词叙录》载录南戏剧目“宋元旧篇”65 种, 这更是一个挂一漏万的记载, 宋代南戏传播亦广, 演出活动频繁, 宋代南戏剧目之数当不在杂剧之下。南戏生发于民间, 但其繁荣则与文人的参与大有关系, 南戏的诞生地温州就有几个书会, 书会中的“才人”为戏曲艺人编写南戏剧本。现存早期南戏剧本《张协状元》就是九山书会的文人编写的。文人参与南戏剧本创作, 亦可见出以俗为美不仅仅是“愚夫愚妇”的审美取向。

宋代俗文学已不再是雅文学的附庸, 而是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 这不仅反映在俗文学作品数量众多和吸附着大批读者、观众上, 而且也反映在俗文学的文体独立上。

宋以前并非没有描写民间生活、抒发百姓情感的作品，但这类作品不仅远不如宋代之盛，更主要的是：她和雅文学在文体上并无明确的界限，也是用属于贵族的文言写成的。宋代则开创了以民众的口语——通俗白话进行文学创作的先例，为俗文学的文体独立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使俗文学与雅文学在文体上有了明确界限，终于使俗文学以独特的面貌从雅文学中独立出来。用通俗的白话进行文学创作不仅是汉语史上的大事，更是文学史上的大事，因为这一文学语言的选择标志着俗文学的真正独立。从此，俗文学才以独立的面貌构成文坛的一翼。

以俗为美不仅反映在俗文学创作的繁荣上，同时还反映在文人士大夫对来自民间的通俗文艺样式的利用与提升上。

词是来自民间的通俗文艺样式，多以女性口吻写成，以便传唱，是当时广为流传的“通俗歌曲”，故又称“曲子词”。尽管南唐后主李煜“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sup>①</sup>，但在宋人眼里，词还是非正统的“艳科”、“小道”，一直到南宋还有不少文人持词“别是一家”的看法<sup>②</sup>。在这些文人看来，只有诗和散文才是正统的文学样式，宜于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至于来自里巷的“曲子词”则属于“末技”、“小道”，故不需要像对待诗文那样去对她进行干预，也不宜将“重大题材”写入词中，词是反映一己之生活——甚至是个人私生活的“艳科”。北宋中期欧阳修所领导的第二次古文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笼罩宋代达几十年的不良文风得到纠正。然而，第二次古文运动主要是在诗、文领域展开的，词的革新远晚于诗文，而且苏轼“以诗为词”，开创豪放词风，曾长期受到宋人的批评和讥讽<sup>③</sup>。

然而，宋人并不因为词来自民间，属于“小道”、“末技”而弃之不顾，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文人士大夫都乐于填词。有学者认为，宋人之所以热衷于填词，乃是因为意识到唐诗盛极难继，词为新兴样式，且形式上较为自由，篇幅又较诗为大，故转而效力于词。我以为，这种说法只是道其皮相。其实，宋人于诗亦用力甚勤，宋诗的艺术成就亦未可低估。宋人于诗歌领域别创迥异于唐的“有宋风格”，怎能说宋词之兴根于文人舍诗而就词？宋人效力于词固然与词属于新兴样式形式较为自由等因素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宋人对俗文学的容纳远胜于唐人。大批文人涉足词苑，借助这种通俗的样式来表现属于个人的“私情”，是以俗为美的价值观念在文人士大夫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具体体现。

## 二

以俗为美的审美趋向和审美特征的形成，是文化平民化进程的一个具体成果。宋代文坛雅俗并峙格局的形成需要置于文化平民化进程的背景之下去加以观察，否则，无法正确估量其文化意义。

文化平民化进程肇始于中唐，至宋代而获得了加速发展。究其根源在于：中唐以后，有了文化平民化进程的合适气候和良好土壤。唐代以前，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是以门阀士族地主为主体的。门阀贵族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财富，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更重要的，他们操持权柄，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枢纽。“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就是以门第高下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特权制度。“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考其真伪”。既然选拔官吏只需要凭借谱籍查考其门第高下，那么，各级官府势必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种状况

一直到唐以前都没有太大的改观。唐代统治者夺取政权之后,仍然尊崇门阀,但同时又感到被削去权力的某些旧门阀贵族对新王朝均构成了很大威胁,痛切地感到必须重新调整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大限度地降低旧门阀贵族对政权的垄断。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但最根本的还是剥夺门阀贵族的“命根子”——门第高贵的政治资本。唐代初年即开始重修谱牒。唐太宗在诏令高士廉等修撰《氏族志》时,明确反对以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旧门阀贵族为“第一等”,主张“不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按照这一原则,《氏族志》一百卷共收293姓,1651家,分九等,一等为皇族,二等为后族,然后依次是山东崔氏等旧名门望族。很明显,这里虽然对旧门阀贵族有抑制,但门阀观念仍然起主导作用。20年后《氏族志》修改并易名为《姓氏录》,仍分九等,但只以当时的品位高下为序,虽出身士族而品位卑下者不录,出身庶族而官至五品者入选。这里士族与庶族地主合流的倾向更加显著,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门阀士族专权状况的改变和庶族地主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

然而,尽管中唐以前门阀贵族的势力一再受到抑制,但他们仍然有很大的势力,其影响更是远未消除,社会上依然相当普遍地尊崇门阀。例如,在婚姻上依然讲究“门当户对”,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朝廷重臣仍大多由门阀贵族充任。

安史之乱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就社会政治结构而言,此后,门阀贵族受到越来越沉重的打击,庶族地主的社会政治地位上升。握有兵权者专擅是中晚唐乃至五代时期十分突出的政治现象,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状况得到改观。唐末农民大起义又给门阀贵族以毁灭性的打击。出身于低级武官的宋太祖赵匡胤靠兵变夺得政权后,采取各种措施——特别是通过完善科举制,大量网罗“庶族之俊异者”,有意识地限制、剥夺豪门贵族的政治特权,扩大其统治的政治基础。于是,在宋代政坛上与过去“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相反,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新情况,发迹变泰的庶族地主乃至一部分自耕农、商人成了政治舞台的主角。“谱籍”不再是仕进入官的主要依据,所以,宋代出现的《百家姓》不再分等级,只将握有皇权的赵氏列于篇首。《百家姓》取代《氏族志》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唐以后社会政治结构的深刻变革。

文化平民化进程的开启与加速发展既需要有合适的政治气候,还需要有良好的经济土壤,中唐以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一系列经济政策对于文化下移是有促进作用的。

安史之乱以后,军阀割据,朝廷失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国有制——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官府的租税收不上来,国库空虚。这迫使李唐王朝不得不实施新的经济政策:容忍商业经济的发展,从中获取财税收入;改变自西晋以来即开始实行的以人丁为数征收赋税的税制,而以资产、贫富为差征收赋税。这一新的税法显然抑制了占有大量土地、财富的豪门贵族,对庶族地主和自耕农有利。宋代继续鼓励商业经济的发展。宋代朝廷一改贱视商人的传统观念,把商人列为国家承认的“四民”——士农工商之一,允许商人及其子女参加科举考试,对商人与宗室、官员联姻亦不加限制,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前朝。宋代的市民阶层得以迅速崛起,城市也随之增加。唐代之时,10万户以上的城市不到10个,宋代则增至四五十个。

宋代逐步改变按官职授田土的特权制度,限制贵族兼并土地,允许私人购买田地、庄园,正式制定了保护土地买卖的法律条文。宋代朝廷不允许地主拥有奴隶式的“私民”,没有土地的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缴纳地租,但其身分不是奴隶,而是统一编入国家户籍的

“客户”，他们与“主户”只保持劳务关系。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程度明显削弱。

总之，中唐以来，特别是宋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抑制门阀贵族、容忍甚至鼓励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赋税、户籍制度的改革等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提高了庶族地主、自耕农、商人的社会地位，使某些社会阶层（例如市民与自耕农）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被剥削者（包括富豪家庭中的奴婢）对剥削者的人身依附较前朝有明显的削弱。这就为文化下移——文化的平民化进程创造了此前所缺乏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使文化的平民化成为一种时代要求。以俗为美的审美特征的形成正是这种时代要求在审美领域的具体显现。

### 三

诚如许多学者所反复指出的那样，唐代文学创造的是“才气发扬”的宏壮之美，宋代文学则属于“思虑深沉”的阴柔之美，宋代文学的特征与整个宋代文化的品格是一致的，而这一品格又是植根于“其时代之心情”。所谓“时代之心情”是指一个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超个体的社会心理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

论及一个朝代的社会状况当然不可能不对其经济状况作出估价。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对上层建筑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论及宋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和审美特征时，很少有不论及宋代经济的。然而，有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似乎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太大注意：有些学者在论及宋代话本、戏曲等“市民文艺”的兴盛时，称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等记述两宋都城状况笔记的记载，把宋代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描绘成“花光满路”、“民物康阜”，一片繁荣景象，仿佛历代繁荣均不及宋代之盛；可是，一旦论及那些感时伤世，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则又称引其他资料，把宋代经济——包括工商业经济描绘成萧条零落、凋敝穷愁的衰败景象，仿佛其落后贫弱又为历代之最。陷入这种自相矛盾之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正确论断作了教条主义的、绝对化的理解，把经济因素夸大为唯一因素，又将其“决定作用”视为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前者的简单关系，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泥坑。有些学者为了自圆其说，把宋代经济说成是“农村贫穷，城市繁荣”、“畸形发展”、“虚假繁荣”，其实这些论断也是不准确的。宋代经济——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亚于唐代，对此，我国史学界已有明确论断：

宋朝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并且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封建帝国。其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并且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宋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宋代社会生产有迅猛发展，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唐朝，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唐诗与宋词的主要取向与境界，全不相同，自难以断言其间的高低优劣，但宋代的词和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全面发展，则非唐代之所能及；而从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史学等方面作综合比较，宋代无疑地都超过了唐代，成为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鼎盛期<sup>④</sup>

既然宋代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宋代社会属于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

期,那么,为什么植根其上的宋代文学却缺乏唐代文学那种豪迈的气魄和磅礴的气势?相反,她神情忧伤,出言凄苦,许多作品蕴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浓重的感伤情绪,就象欧阳修在《秋声赋》中所描绘的“秋声”那样,“其色惨淡”,“其意萧条”,即使是“奋发呼号”,也常常透露出苍凉凄楚之气?我以为不能只从经济因素去寻求对艺术生产的解释,而应该深入剖析宋代社会心理所折射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复杂成分。换一句话说,“思虑深沉”的宋代文学是宋代社会心理的艺术写照,而宋代社会心理的形成则与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成分所构成的“综合国力”——国势直接相关。

#### 四

唐宋相较,宋代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然而,宋代的国势是根本无法与唐代相比的。唐代国势日渐强盛。李白在《古风》诗中写道:“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杜甫《忆昔》诗写“开元盛世”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李白、杜甫的描写并非言过其实的夸饰,唐代国势从唐太宗贞观年间起日渐强盛,经武则天朝的规划经营,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步入“全盛”期。安史之乱以前,唐朝不仅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政治清明,而且在军事上开疆拓土,拥有广大的版图。唐代文化因为有强盛的国势作为依托,因而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对周边国家乃至欧洲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唐代人——特别是社会的“神经”文人士大夫都能亲身感受到国势的强盛:比年丰稔、边鄙无虞、疆域广大、万国来朝。身居此境,当然会富有豪迈的气魄和十足的自信;发于歌诗,自然是“才气发扬”的宏壮之美。

宋代的国势却呈日渐衰微、江河日下之势。这一点宋代的有识之士就曾反复指出。换一句话说,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是亲身感受到宋代国势之不振的。

北宋立国之初,由于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社会安定,生产得以恢复,社会经济呈上升趋势。北宋中期在宋代历史上应该说是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然而,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却这样描述当时的国势:

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惴惴然常恐天下之不久安。

王安石的描述是准确的,这种积贫积弱之势早在宋太宗时就已开始显露,真宗时进一步加剧,至仁宗时则正如所言,已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了。为了改革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北宋中期先后有范仲淹、王安石实施“新政”,但由于改革触及大官僚的切身利益,众心不悦、众口藉藉,“新政”遭到强烈反对而告失败,积贫积弱之势不但未能扭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北宋徽、钦二帝为金兵所掳,北宋政权倾覆。南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版图最小的封建王朝,尽管其社会生产在北宋的基础上还有所发展,但其国势却更是衰微不堪了。生活于南宋前期的古文家叶适在《论纪纲疏》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国势:“天下之势弱,而历数

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生活在南宋后期的诗人刘克在《贺新郎》词中写道：“国脉微如缕！”《宋史》卷四三八《黄震传》论及南宋之国势曰：“当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

既然宋代的经济、文化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空前的”，那么，为什么宋代的国势之衰微却如此严重呢？我认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与国势有联系，但又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很难设想，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经济凋敝、文化落后，其国势会日渐强盛。然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很高的朝代、国家，其国势不一定都呈强盛之势。这是因为，国势是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种成分交互作用、共同构成的“综合国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中央政府所拥有的军事、经济实力。从这个角度看，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唐代的宋王朝的国势呈积贫积弱、日渐衰微之势是不难理解的。

宋代国势衰微与以文制武、虚外守内的治国方略有密切关系。宋太祖赵匡胤出身于武官，靠手中的兵权夺得皇冠。因此，他非常害怕握有兵权者专擅，从他手中夺走来之不易的皇权。于是，他剥夺高级将领的兵权，以文人充任各级官吏，制约武将，导致军队丧失抵御外侮的战斗能力。但是，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发动进攻，宋朝又不得不用扩军的办法去“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结果是：军队的人数越来越庞大，军费开支有时高达占全部财政收入的80%，成为朝廷无力负担的一个沉重包袱。

宋朝立国之初就开创了以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缴纳“岁币”以图苟安的恶例，此后几乎代代相沿，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签订割地赔款、俯首称臣的“和约”，需经常向“敌国”缴纳大量财物，至使本来已经入不敷出的中央财政雪上加霜。

尽管宋代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宋代官府对民众的盘剥、搜刮也极其苛暴，宋代中央财政的收入数倍于唐，然而由于宋代财政的支出往往是唐代的几十倍，因此，收入颇丰的宋代财政不断发生严重危机。由于宋代统治者昏昧不明，边患不断，其实际拥有的综合国力远远无法同唐代相比。生长在宋代的人士大夫根本不可能感受到宋代的强盛，宋代的历史地位是我们今天对宋代社会发展水平进行动态考察所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不单是对宋代国势的认定，更不是宋人当时对其国势的切身感受。宋代文人生活在社会安定、无比强盛的唐代之后，有一个鲜明的对照，亲身感受到的是：朝廷昏昧、官场黑暗、军队羸弱、国库空虚、边患不断、山河破碎、神州陆沉。居身于此，怎么可能不是满腹愁肠！怎么可能象唐代人那样“向外发扬”！

#### 注 释：

-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李煜之后，词的雅化越来越明显，但宋人视词为“小道”、“艳科”仍不是个别现象。
- ②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载李清照《词论》，有词“别是一家”之论，对苏轼“以诗为词”提出批评，认为其作“直如酌盞水如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
- ③ 陈师道《后山诗话》曰：“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
-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2页。